

资源与经济：民国以来鄱阳湖的渔业发展变迁

——以江西省余干县瑞洪地区为研究视点

吴贻 吴良成^{*1}

【摘要】：鄱阳湖凭借其优越的自然资源形成了渔业经济。余干县瑞洪是鄱阳湖最大的渔港，以其为中心考察民国以来鄱阳湖的渔业发展情况可以看到：鄱阳湖渔业由民国时期的缓慢发展与衰退到新中国成立后“繁荣”发展的变迁过程，及其在民国时期面临的困境，人们不宜过高评价这一时期鄱阳湖的渔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鄱阳湖渔业蓬勃发展，适应了经济发展要求，形成了一些重要特点。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应该全面考量对鄱阳湖区域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渔业。

【关键词】：鄱阳湖，自然资源，渔业经济

渔业史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与渔业史相关的研究领域，如中国渔业史、海洋渔业史、沿海区域渔业等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发表。因学术诉求不同，学界对民国以来鄱阳湖渔业发展的综合研究还是空白，未见专门论著问世。本文以余干县瑞洪为中心，拟对民国以来鄱阳湖渔业综合研究作一尝试。瑞洪现属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管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习惯上把包括现在的瑞洪镇、康山乡、新生乡、梅溪乡、东源乡在内的广大地区称为瑞洪地区（万振凡、张宏卿，2004：2）。瑞洪属于典型的渔业社区，新生乡西岗村办渔业高级生产合作社时，鱼的年产量就高达130万斤，全社计划渔民总收入263557.51元，其中渔业收入159058元，占总收入的60.4%。瑞洪渔业活动范围约为鄱阳湖面积的3/4左右（余干县《瑞洪方志》编纂委员会，2004：131），其盛衰与鄱阳湖息息相关，因此，以余干县瑞洪地区为中心来考察鄱阳湖渔业有其典型性。

一

瑞洪位于东经116°13′47″-116°54′25″、北纬28°21′36″-29°04′24″之间，地处余干县西北、鄱阳湖东南之滨，信江入湖处，北接鄱阳县境，西连新建县鄱阳湖沿岸一带，连同诸多湖心小岛，以瑞洪镇附近为渔场中心地。瑞洪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阳光充足，草洲滩地漫无边际。湖区水域内的浮游生物十分丰富，现已鉴定的浮游植物有154属，分隶于8个门，54个科（《鄱阳湖研究》编委会，1988：118），多数属富营养型，是鱼类的天然饵料（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574）；还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群丛，是鱼类避敌、产卵的场所（《鄱阳湖研究》编委会，1988：126）。除了鄱阳湖，瑞洪还有信江、康山河、程家池、七担里港等河汊以及东湖、南疆湖、杨林浆湖等塘湖，河湖纵横交错，信江、抚河和赣江在三江口汇合（余干县《瑞洪方志》编纂委员会，2004：61—65）。良好的自然环境非常适于鱼类生长，瑞洪是鄱阳湖的天然活鱼库（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574）。

瑞洪地区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其天然鱼达22科、126种之多，几乎涵盖了全部淡水鱼类。瑞洪名闻遐迩的鱼种主要有银鱼、针公鱼、凤尾鱼等。银鱼古称“脍残鱼”，是鄱阳湖定居性的重要经济鱼类之一，鱼体洁白透明（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574）。

¹ **作者简介**：吴贻（1977—），男，江西余干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海 200234）吴良成（1979—），男，江西余干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江西 南昌 330022）

会，1999：583），具有养生功能，还可烹调多种名菜，其中红眼银鱼曾为“贡品”（余干县志编纂委员会，1991：197）。瑞洪沿鄱阳湖湖岸线较长，境内有许多天然的渔港：锣鼓山、驾湖、康山、江家、西岗和东源等，瑞洪镇本身是鄱阳湖最大的渔港。它们是渔船停靠和避风场所，并具有渔业加工、中转和船舶维修等综合性能（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605）。渔业是瑞洪的传统产业，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渔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渔具改进为劳动强度小、高效益的网具，主要有巴网、大网等；还有钩业和鱼笼等（余干县《瑞洪方志》编纂委员会，2004：134）。其他则为杂业，包括鸬鹚（鱼鹰）、摸脚迹和堑湖等（《上饶市农业志》编纂委员会，198：431）。

1936年《江西年鉴》记载：瑞洪是“盛大产鱼地最著称者，为全省之冠”。1936年前后鄱阳湖主要渔场总产量约36.8万余担，其中瑞洪产量最大，多达7.5万担，其他如鄱阳5万担，九江2.5万担，湖口4万担，瑞昌2万担，都昌2.3万担（刘治乾，1936：850）。表明瑞洪占鄱阳湖主要渔场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强，比九江、瑞昌、都昌三大渔场的总量都要多，相当于鄱阳、九江两大渔场产量的总和。渔民以个体的形式从事生产活动，以家族、姓氏组合成帮，各捕捞场所由族会按照姓氏划片管辖，还有专门渔业工具和专属作业地点的习惯。当时瑞洪有3500渔户（刘治乾，1936：850），占余干总渔产数的63%以上，又以西岗、东源渔民、渔具渔法最多，捕捞范围最广。

瑞洪渔业加工与贸易历史悠久，1936年渔业对外贸易就高达4.2万担（《上饶市农业志》编纂委员会，2005：467），加工方法分为晒干鱼、腌制咸鱼、红曲鱼、酢鱼四种。从加工主体看，有渔民自行加工和渔商收购加工两种，渔民自行加工的多为干鱼，渔商收购加工的多为咸鱼。20世纪30年代瑞洪就有渔行20余家（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661），“各地之鱼行，销售鲜鱼者甚少，均系向渔民收购鲜鱼，自行加工处理，用盐盐藏，出售腌鱼者为主要之营业，计有较大之鱼行，为瑞洪之张公和、吴利群、张利丰三家”，康山和大塘均有鱼行（余干县志编纂委员会，1991：208）。民国时期，“以余干县瑞洪加工量最多，盐鱼年加工量达三万担，为湖区各县之冠”（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661）。瑞洪外销既有盐鱼，也有鲜鱼，除销往省内各县外还远销福建、广东、安徽、湖北、江浙诸省。

二

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战争原因，日军窜入江西后瑞洪渔业出现了严重的衰退。1936年沿鄱阳湖各主要渔场的产量共约36.8万余担，并且有大量的出口到外省；而“抗战时期，湖泊江防都封锁，全省的渔业，几陷绝境”（王松年，1949）：“抗战胜利后，虽经各方面的努力，但出产仅在25万担和30万担左右，只够本省消费，还不能谈到出口”，1949年鄱阳湖渔业总产量仅有1.34万吨（《鄱阳湖研究》编委会，1988：223）。只相当于1936年前后总产量的72.8%，下降了1/4以上。

渔民生活是渔业的“晴雨表”，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当地渔民生活十分困苦。当时鄱阳湖区渔民一般生活情况是“卖鱼易米，朝不保夕，父母忍饥，儿女号寒，为其惯常生活，至于餐风饮露，不避强风烈日，犯波涛凌霜雪，辛苦更不足论，各地渔夫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少至五六元，多者亦不过十余元，而一家数口赖此为生……至如渔商之剥削，以及捐税之负担，更使渔户之穷困生活愈为深刻”（江西建设厅，1935）。抗战时一篇通讯《鄱阳渔区归来》，详细地描述了当时鄱阳湖区渔民的生活情况：本省渔户生活极为贫困，“非有如诗人所歌咏渔家乐之者……生活几有不能维持者矣”（吴宗慈，1984），渔民极其困苦的生活跃然纸上。又如，1936年鄱阳湖一带，春末夏初洪水泛滥，田园屋舍尽为浊浪冲淹，渔民罹疫死亡，无法统计……渔民生活陷于绝境。再如“沿湖一带，历年湖水涨落不定，农事耕种苦无适当土地，生活所赖唯有破碗旧船，平时一日不出湖张网，即有断炊之虞”。还有“战后马不守，湖港设防，一面受敌寇随意杀戮之迫害，一面复感捕鱼范围日益促小，生活苦况遂更不名状……全家老幼均是踉跄在小渔船上，夏季烈日蒸晒，因而中暑罹疫死亡，每无法统计，尤以幼童死亡率之矩，触目惊心”（刘继培，1984）。以上史料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渔民生活困境。新中国成立前几年间，附近的鄱阳镇渔民生活是“一日不做（捕鱼）一日不食”，瑞洪渔民的困苦生活就不难想象。

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对其原因梳理如下，首先技术落后：民国瑞洪渔业捕捞技术有些进步，但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变革，犹如农具，农业生产中大部分还是使用唐代就已经出现的农具。加工方面亦然，“品种单调，方法落后”，“江西鱼品制造业仅

有盐鱼、干鱼、红卤鱼数种，法多简陋。盐鱼仅以盐渍而成；干鱼仅利用日光晒干之；红卤鱼即将鲜鱼以酿酒红曲制成者”（刘治乾，1936：850—851）。其次交通不便：“盐藏品因品质不佳，且运输困难，故大部分销诸本省万载赣县临川等处，鲜鱼因乏冷藏之设备，销路更狭”。瑞洪虽然水路交通便利，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近代意义上的“瑞洪轮船公司”，但没运营多久就遇日寇入侵而关闭（余干县《瑞洪方志》编纂委员会，2004：177）。当时瑞洪根本就没有公路，渔业发展严重地受制于交通的不便。再次是市场无序：鱼商贪图重量，制作加工鱼类时不能达到通常之干燥度，“故难以贮藏久长时间至遭腐败之虞”；鱼价又极不稳定，“各地鲜鱼平常售价，最低时每斤五、六分，最高时四角余”（江西建设厅，1935），渔业的商品化过程受挫，其商品化程度也就不高，从而制约了渔业的发展。战争频仍仍是其重要原因之一：鄱阳湖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无数渔民被杀、渔船被破坏或被征用等等；太平军存续江西达12年之久，鄱阳湖更是太平军与曾国藩等的重点战场（杜德凤，1987），其破坏性影响到民国还存在着。又如时人记述：马当不守，湖港设防，一面受敌寇随意杀戮之迫害，一面复感捕鱼范围日益促小；北洋军阀蹂躏于前，使张网糊口者不暇喘息；七七神圣抗战军兴，不久湖面又是漫天烽火，在敌伪占领或控制区内渔民惨遭杀戮，罄竹难书（刘继培，1984）；抗战时期湖泊都（被）封锁，全省的渔业几陷绝境（王松年，1949）；整个鄱阳湖区的县、市全部被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并受到随后数年国内战争的影响。

另一重要原因是负担过重：“每逢鱼产淡季，便以高利贷预为收购，价格之低，利率之高，竟有借款十元，于五月后除还本外，尚须纳鲤五十斤”（《上饶市农业志》编纂委员会，2005：424）；诚如业师万振凡先生所论：越穷，越要借债，就越要出卖农产品还债，商品经济就越活跃，生产也就越遭到破坏，所以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只是一些同类产品的进进出出（万振凡，1998）。虽然所论是青黄不接时的农业、农民，但对于渔业、渔民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青黄不接”时间不同而已。“渔税多采包办法，系招商承包制度。承包官吏，额外浮收以肥私腹，人民负担与国家收入，其间差额，甚为悬殊”，被称为阻碍渔业发展的“最为恶弊”（李士豪、屈若寡，1998：32）。渔业课税除了渔税、船捐、湖课及其变种课税外还有河课、码头租和徭役等（万振凡，1998：88）。讨论瑞洪渔业负担过重就不能不提到厘金，“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孙毓棠，1962：376）厘金开征之初瑞洪的康山就有厘卡，此后又在厘金之上加了所谓“统捐”，“其扰民更上一层楼”（万振凡，1998：96）。瑞洪渔业不能幸免的还包括：江西省水上别动队第一大队所辖4个中队的经费由当地负担一半（余干县志编纂委员会，1991：388）。渔业成本大为增加，渔民生产积极性势必受到打击，渔业经济衰退是必然趋势。渔民素质低下是其内生障碍性因素：由于瑞洪总体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落后，加上水旱灾害频繁，血吸虫病等，造成湖区渔民整体身体素质差。单就科学文化素质而言，瑞洪渔民散居沿湖各地，距离有文化地区相当遥远且终日为生计劳苦，受教育的时间空间无形被剥夺，史料记载：文盲估计占95%以上；各地早已失去时代性之私塾（在此地）亦不多见，瑞洪渔民属于“急待救济教育组训与领导之群”（刘继培，1984）。人才的出现，一要靠教育的培养，二靠文化环境的熏陶。以上两条当时瑞洪都不具备，瑞洪渔民读书太少、文化素质极低，就谈不上学习和运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来发展渔业，渔业经济的近代化更无从谈起。

鄱阳湖渔业衰落的原因还有自然灾害频繁等原因（吴贇，2009）。显然，日军窜入江西后，无论从渔业的产量、输出量，还是从渔民的生活情况看，鄱阳湖渔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社会生产能力严重下降，物价飞涨，鄱阳湖区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受空前的干扰，越到后来越加严重。这种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善。

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稳定，人工养殖、新的经营机制的引进和现代化管理手段和保护渔业资源措施的实施，瑞洪渔业得以恢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瑞洪渔业更迎来“繁荣”。其情况见表1。

表1 历年来渔业生产情况 单位:吨、亩									
年份	总产量	养殖		捕捞产量	年份	总产量	养殖		捕捞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1949	2512			2512	1981	2538	34915	1231	1307
1950	3013			3013	1982	5515	95000	1525	3990
1956	5674			5674	1983	6503	100000	1750	4753
1957	6500	1040	10	6490	2000	60100	345200	42600	17500
1958	5600	43000	41	5559	2001	63023	345200	46023	17000
1959	4600	55000	350	4250	2002	66312	345200	49212	17100
1971	2586	20976	512	2074	2003	74039	345200	59129	14910
1972	2299	15921	810	1489	2004	82108	358000	68608	13500
1973	4645	31493	821	3814					

（一）人工养殖的采用及推广

由于人口增加、鱼类加工技术上突破和现代运输的广泛使用，渔业捕捞已远不能满足需求。上表显示：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养殖业兴起了，养殖面积从 1957 年的 1040 亩扩大到 1958 年的 43000 亩，再到 2004 年的 358000 亩，均说明养殖被迅速推广。瑞洪养殖起初是由集体在内湖和池塘放养，没有经验和技術，大都是“人放天养”，1959 产量的大幅增长反映了养殖技术有了突破，此后国家采取鱼价开放，推行渔业生产责任制，对圩堤内湖塘大力发展养殖生产，引进外资，采取科学养鱼使瑞洪渔业得到较快的发展。1985 年内湖、内港养鱼 3 万余亩，总产鲜鱼 15600 担（余干县《瑞洪方志》编纂委员会，2004：137）。

渔业综合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渔业产品也不断变化，引进人工孵化鱼类，瑞洪地区由于地理优势，很多人从事养殖工作，引进兴国的红鲤、婺源荷包鲤；在国外引进日本的鲫鱼，非洲的罗文飞鱼，通过人工繁殖并大力推广，每年繁殖名贵鱼苗 400 万尾以上（余干县《瑞洪方志》编纂委员会，2004：132）。渔业养殖拓宽了渔业的发展空间，促进了渔业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广大民众就业和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领域。

（二）新技术和经营机制的引进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最具代表性的是网具材料尼龙化、渔船机械化和阵网的引进，它们不但提高了捕捞效益，而且使渔民的劳动强度大为减轻。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捕捞网具绝大部分是用棉线或麻线制作，少数用蚕丝编织，随着化学纤维工业的发展，化学合成纤维代替棉线、麻线或蚕丝编织渔具，此后，渔具材料除部分繁殖场保留了少量的麻线网外，全部改用化学合成纤维。自古以来，渔民行船历来就是靠划桨、撑篙、摇橹或借风张帆，劳动强度大，行船速度慢，工作效率低。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鄱阳湖地区部分专业捕捞队开始在大吨位的渔船上安装柴油机，利用机械动力行船，以后小型渔船也陆续装上船尾挂机，其中尤以瑞洪镇产量较多。2002 年，余干县有机动力渔船 6838 艘，主要在瑞洪、康山、东源等地。20 世纪 80 年代瑞洪引进了名叫“迷魂阵”的阵网，有深水、浅水的各种各样的阵网（《上饶市农业志》编纂委员会，2005 年：422—432）。上表的 1981 到 1983 年的总产量、养殖面积、养殖产量、捕捞量无不反映这种变化，尤其是捕捞量从 1981 年 1307 吨突然增长到 1982 年的 3990 吨，到 1983 年的 4753 吨，再到 2000 年 17500 吨，说明尼龙网具、渔船机械和阵网等新技术在瑞洪广泛使用，大大增加了渔业捕获量。

渔业市场自由开放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个体渔商，渔贩大量增加，至 1985 年余干县水产供销公司在瑞洪、康山设立收购站，产品除销往文已及的地区外，还远销北京、黑龙江、吉林等地。在做好渔产品购销的同时，收购站点还设有渔需物资供应门市部，向渔民供应大量桐油、橡胶靴，下水衣及生活用品。私商加工和渔民自行加工又逐渐增多，1992 年 10 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余干县康山食品罐头下的酒糟鱼获铜奖（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674）。渔业是市场化启动较早和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产业，正是经济市场化把瑞洪渔业带入了新的“繁荣”。

四、结语

瑞洪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应鱼类生长，是鄱阳湖的天然鱼库，境内有许多渔港，其渔民的渔业活动范围约为鄱阳湖面积的 3 / 4 左右，成为鄱阳湖区域典型的渔业社区，形成了发达的渔业经济。本文描述了湖渔业在民国时期的缓慢发展、衰退到建国后“繁荣”的变迁过程，并深入探讨民国时期鄱阳湖渔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因此人们不宜过高评价民国鄱阳湖地区的渔业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瑞洪渔业得以恢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蓬勃发展，适应了经济发展要求，形成了某些重要特点，将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应该全面考量对鄱阳湖区域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渔业。经济市场化把渔业带入了新的“繁荣”，但这“繁荣”背后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说人口剧增、过度开发、河道淤塞和渔业自然生态恶化等，有些正在加深并有恶化的趋势。人类应该如何合理开发鄱阳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笔者将另外行文加以讨论。